

自由論壇

論社

第三卷

第二期

政治上的死路與活路

從外人對我的評論說起（補刊）

論哲學方法

經濟建設與企業形態

法西斯教育之改造

民族活力之毀滅

英國菲賓社

戈吉野及其時代

關於民主政治（通信）

本社

本社

馮友蘭

楊克成

By Kun-n K. Kurthara
李廷揆譯

吳晗

王康

聞家驊

固城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自由論壇社發行

雲南省合作金庫

通匯地點

羅次武定元謀尋甸易門
 祿勳嵩明大姚祥雲鶴慶
 賓川蒙自鄧川大理雲龍
 景東緬甸永勝玉溪路南
 宜良開遠曲靖通海彌勒
 寧洱昭通曲靖麗江保山
 雲縣廣通勐平順甯楚雄
 各縣庫辦事處通匯地點
 除上開各 外省內外各
 大地均能通匯

省庫通匯縣份

匯兌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穩妥可靠

存款

活期存款
 收付迅速
 定期存款
 利息優厚

信託

代理供銷
 代理收付

放款

合作放款
 農業放款

庫址：護國路自動電話二四六八電報掛號一五五

昆明縣銀行

行址

昆明南屏街

及 商 業 行 業 務
 一 切 銀 行 業 務
 放 款
 存 款
 匯 兌
 業 務

社論

政治上的死路與活路

本社

抗戰到了最後的五分鐘！

最近半年，物價漲到戰前的一千倍，貪污營私的案件層出不窮，河南湖南戰事失利，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也將淪陷之後而進行壯烈的保衛戰，我們的空軍，我們的祖先，億萬青年犧牲於斯作於斯，曾經創造過光榮燦爛文化所滋養的空間，已縮小到無可再縮了。

擺在前頭的一條是死路，一條是活路。

在這嚴重的關頭，蔣主席在幾次的宣言和講話中，會痛切指明，要國民自己檢討反省，不要諱疾忌醫，要指出病態，喝對症下藥。

我們認為當前的一切困難，軍事的，經濟的，社會的，一切一切的總因子是政治問題，單從技術的枝節的去解決個別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正如南轅北轍，緣木求魚，是決無效果的。舉一個衆所周知的例證說，軍官虐待士兵，剝奪軍餉的弊端，過去已經政府三令五申嚴切禁止，法令多如牛毛，然而最近還得煩勞主席重申約束，又如物價管制，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定律，就是「漲漲平平，平平漲漲」，就漲一次，就承認要成事實平價一次，平價一次，物價又漲一次。最近本市平價的結果，二百元一斤的豬肉，平價後不成二百五十元一斤，正是一個好例子。

一切困難之母的政治問題，解決方案極簡單，一言以蔽之曰：民主憲政。這是今日中國的唯一活路。雖然這問題已成老生常談，然而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今日的開明不在知，還是在行，於此我們提出幾點對政府的期望。

第一 國民的自由。在為自由而解放而戰爭的今天，則其說自由

是政府所賦予的，毋寧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有了人民的自由，才有民族的國家的自由，這是不容欺側曲解的真理。英國著名政治學者拉斯基以為人民在平時固然有自由，在戰時尤其應該有自由，一個在戰時人民沒有自由有國家，是無法作戰的。拉氏的話最好註腳是法西斯國家的潰滅，意大利德意志日本三個法西斯強盜，在軍力的控制下，他們的人民被剝奪了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職業，身體自由，不許人民批評政府和發表意見，單憑當國的少數人一意孤行，結果是墨沙里尼政權的傾覆，希特拉和東條的墳墓也已經掘好了。我們爲了和英美蘇等民主國家併肩作戰，爲着爭取勝利，應該在事實上還給人民以自由。完美而無缺的一切自由，賬簿式的法律條文我們已經太多了，我們要的不是紙上的文字，而是具體事實的表現。這一點如能辦到，統一自然不成問題，勝利也如操左券！

第二 民主的實踐。關於民主，關於憲政，無論朝野，無論賢愚，都知道是抗戰建國所必須經過的步驟，就知行合一的原則說，我們是知而又知，問題只是在行，在實踐。在新憲法未頒布以前，何妨實行并未經立法程序廢止的訓政時期的約法。有法總比無法好，等新法何如先守舊法！只要政府能守法，國民自然會守法，愛法，重法。在大法之下，政府和人民上下一體，遇事處人都以法爲前提，不論宗族，不論性別，不論貧富，不論思想，不論教養的深淺，不論地位，人人平等，一律受法律的保護和制裁。在這樣的運動之下，作官的不敢貪污了，貪污的不論地位高下，都要受法的制裁，帶兵的敢虐待剝削兵士了，虐待和剝削兵士的不論地位高下，都要受法的制裁，人民不

會經避兵役了，因為他們自己是主人，為自己而戰。吃得飽，穿得好，家屬生活有保障。為什麼不上前線去流血！物價有辦法了，因為人民加緊生產，商人守法，不願囤積居奇。國家統一了，因為各政黨都有其合法的地位，政策的能實行與否，取決於國民公論。民主是一個鎖鑰，只要拿到這鎖鑰東西，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勝利和光明的前途在等待着。

第三 訓政的結束。中山先生遺教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建設民主國家，如政府當局所昭示軍政時期早已結束，憲政時期即將到臨，訓政的時期當然是訓政時期的尾聲了。蔣主席在參政會開幕辭中鄭重申明早日還政於民的諾言。根據遺教，在這時期中人民應該接受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選舉權的實際行使的訓練，過去由於對內對外戰事的阻撓，使政府無法實行遺教，訓練民衆行使政權，現在勝利即在目前，國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團結，而且對外戰事結束之日，即為憲政實施之時，論步驟，論時機，論國內外人心，都不可或緩，對於訓政的實施措施，上以明大信，下以固根本。這是當前最應先決的問題，能辦到這一點，人民有了選舉權，就可以選出全合理的辦事人員，人民有了罷免權，就可以肅清誤國殃民的官吏了，政府的政策在全民同意的條件下，團結，精誠合作，同舟共濟，一定可以光榮的成功的到達彼岸！

最後，當前為全國人士和友邦所注意的國共問題，參政會中兩方代表所公佈的交涉文件，和參政員延安考察團的組成，已經表現了解決的契機，這可以說是自有參政會以來的最大的收穫，根據兩方面的報告，中間仍有若干距離，距離的原因是中央政府提出的先決問題是軍令統一，中共政府提出的先決問題是實行民主憲政。

中央與中共的爭執，我們願意引用一句話「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兩黨間之有距離，不止是兩黨的不幸，也是全國人民的不幸。中國政黨和英美的政黨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不同點是中國的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都有土地與人民，都有政府，英美的黨都用辯論和宣傳，得民者常政，失民者在野，黨政者措施不愆，失去民心，便廢該

下台讓在野黨來幹。中國式的政黨則恰好相反，黨爭的唯一工具是武力，是由黨所訓練的軍隊。

根據蔣主席早日還政於民的諾言，我們認為兩黨的距離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消除的方法極簡單，如上文所說。第一還給人民以自由，第二民主的實踐，第三訓政的結束。

在民主的實踐之下，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的，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的政黨在法伴上地位一律平等。用不着軍隊來爭取政權，軍隊屬於國家，屬於人民，只有得人民擁護的政府才有權發布軍令，指揮軍隊。這樣軍令統一了，憲政也實行了，其他支節的問題例如地方政權問題，防匪問題，軍隊的編制與給養問題，黨的宣傳與活動問題，釋放政治犯問題等等，都用不着支節討論，可以迎刃而解，因為在這一全民政府之下，根本不可能發生這些問題。

我們環顧內外始終認為當前的局面已呈非變不可之勢，就國民黨前途而言，以及就整個國家的命運而言，只有一個勇敢而全面的改革才是幸福之路。國民黨是當政的黨，過去有最光榮的歷史，現在又勇敢地擔起領導抗戰建國的重任，有賢明的領袖，有最大多數的人才，它最堪擔負這必「變」的契機。我們以最沉痛的心情，希望國民黨能珍重這點驚心動魄的事實。時不人待，稍縱即逝矣。

治亂絲應當用快刀一割，枝節的討論研究和解決，是無補於事的。今日中國的統一解放，最後勝利的取得，只有一條是活路——民主與憲政的實踐。



從外人對我的評論說起

（補登）

本 社

一年以來，同盟國的朋友時常發表批評中國的文稿，特別是美國的記者或作家。我們見聞所及的便有鮑爾溫，畢森，賽珍珠，葛瑞門，懷特等好幾家，都是一些比較長的文章，其它短篇與零星的評論大概也不在少數，我們間或看到聽到，但在中國的流傳極有限，因此也就不，相干。

這一類的評論家文字很有幾點是共同的。一，它們都是綜合性的，就是，批評的方面儘管有所側重，例如軍事，政治，或教育，但總是從中國的全局着眼着手，或以中國的全局做背景。二，它們都是不客氣，都想講一些關於中國的老實話，在此一年以前，特別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美國對中國的輿論，無論是口頭的或紙上的，是一致的不維的，恭維得我們出一身冷汗。中國為四強之一就是這時期喊出來的。但此形勢突然轉變，國不是從此便沒有人恭維，而是恭維有了限度，一面有人恭維，一面也有人譏諷，或同一個人一套議論裏，說好說壞的話都有。即如最近從太平洋彼岸來華的朋友說起，最近對輿論依然恭維中國，但恭維的對象，不是全中國，而是中國的農民，認為對於這一次抗戰，農民的貢獻最大，犧牲很多，而最不屈三功！。各種評論中所敘的事實，十之八九是準確的，間或有形容過大的地方，那在不以文字誇辭，以辭害意的讀者自能辨別，認為不聽宏旨，四，各種評論的動機無疑的都希望中國走上更健全的路，換言之，都是善意的。中國是同盟國之一，同盟的休戚與中國的休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中國之於同盟，好比鐵道之於鐵鏈，在一種緊張的局面之下，一環的鬆弛就等於全鏈的崩潰；所以，自因推果言之，一種善的動機是法避免的。而各種的諷刺譏刺也離乎能證明這一層。再就中國的友誼與中國自身的立場言之，如果美國大憲章員武裝的參加

中國戰場是「愛之能弗勞」的一種表示，那末，這一類形諸筆墨的評論便是「忠焉能弗諷」的一個表示了。

一友我們願意從這樣一個「忠焉能弗諷」的立場與態度來接納盟國朋友的批評，並且希望國人也採取同樣的一個立場與態度。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在平時需要兩益，臨事更需要運用比較強有力的意志。給別人教訓一頓，而肯虛心聽受，從而在行為上作進一步的努力的人，是不可多得的。拜耳曾的禹，開過則書的子路，歷史上又有幾個？這其間的困難不止一重，必須把這幾重困難打破之後，我們才能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實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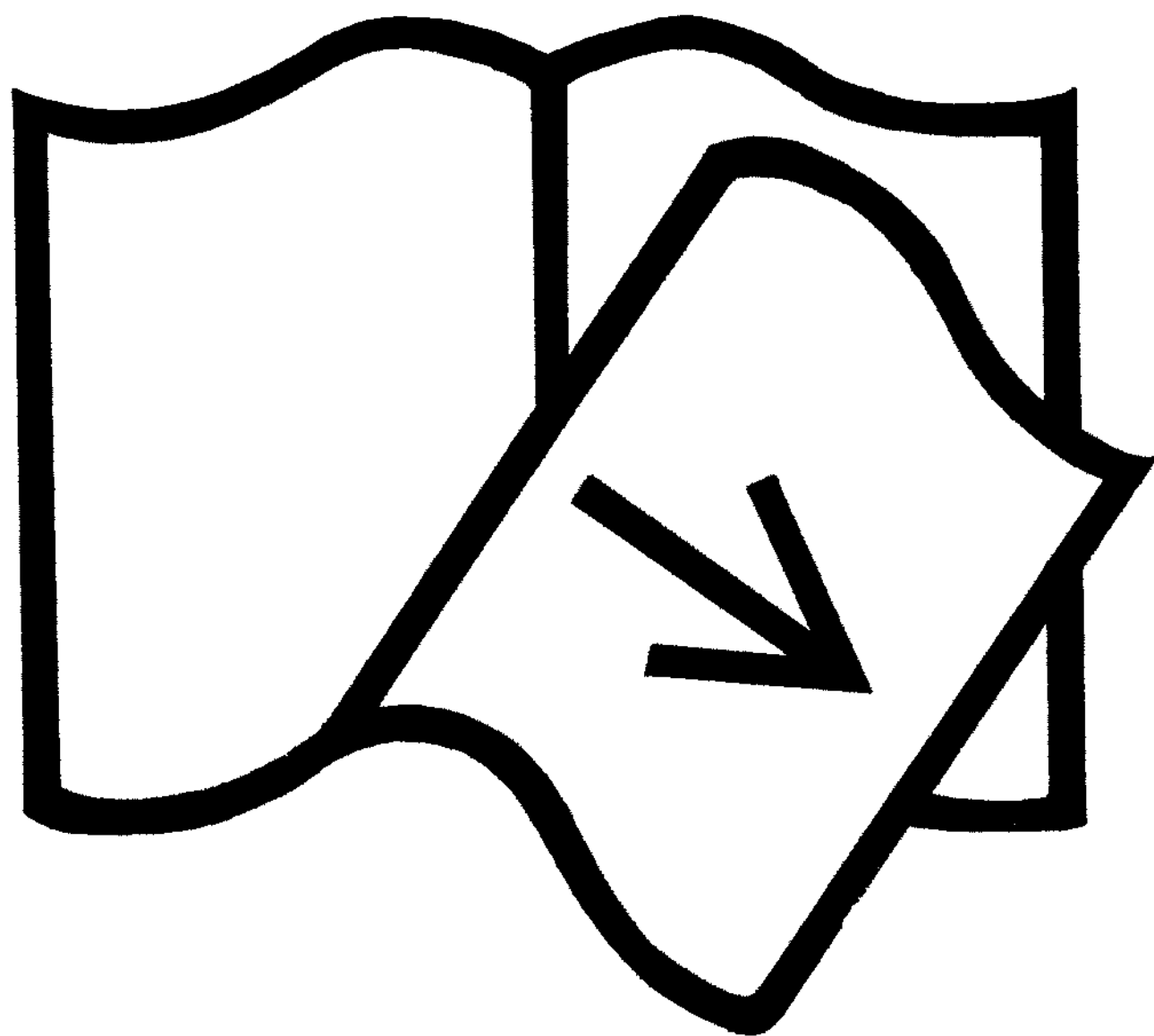
第一重困難是中國人最愛面子，愛到一個像基督教徒愛他的靈魂的程度；對於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甚麼都可以放棄，只是面子不能放棄。明恩溥牧師論述中國人的特性，第一章就專講「愛面子」。面子本身並不是一件壞東西，好其名聲與榮譽不是壞東西一樣。三代以下無有不好名，名也就是一種面子。不過面子有大小，有大我的面子，也有小我的面子，名實相副的面子，也有名實不相副的面子。面子的哲學深入人心的結果，或專講面子到一個愛不忍釋的程度以後，特別是一個經濟困難教育落後的環境裏，勢必至於人人只講小面子。小我的面子，名不副實的面子。我們中間一般人講的就是這種面子；這種面子最經不起別人的批評，批評了可以引起罵街，可以構成攻門，可以激動地方的公憤，如果範圍更大，牽涉的人更多，在今日的情勢之下，更可以醞釀為國際的交涉，至少被批評的一方面會要求批評的一方面把新聞記者撤回。讀者注意，我們說範圍大，人數多，並不說面子大，所牽涉到的面子可能的還是很小的一種面子，所批評的話可能的不過是淺句不大中聽而難真相不太遠的老實話。這是第一重困難

這樣一個愛面子的國家又偏偏碰上了個專門撕破面子的時代。一百年來，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東收於濟，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的一大串國際關係把我們的面子破壞得一乾二淨。對於我們，一部近代史簡直就是一部面子毀滅史。這一種面子倒並不是小面子，而是一種再大沒有的面子，因為幾番挫敗的結果根本暴露了我們內在的弱點，我們政治的腐敗，文化的腐敗，以至於民族的種種惡劣根性，從此和盤托出，再也掩飾不住。不用說，這是誰都可以見而傷心的，百年來為而痛哭流涕長太息，也正復大有人在。不過如果我們不肯諱疾忌醫，我們應有的看法是，面子難亡，生命還在，只要一息尚存，此心不死，造成面子的種種條件不難恢復，面子本身也就不難恢復。不幸的是，我們並沒有很切實的踏上這一條恢復的路，就絕大多數的人說，我們沒有積極的圖謀恢復，而只是消極的想像恢復。我們連想過去，因為過去是比較完正的。我們希冀未來，因為未來是可能完正的，至於目前不完正的狀態，我們但願聽而不聞，見而不視，最好是把它按下去意識的境裏去，如果有人提醒，那是天下第一個不識相的人。一個身體上有殘缺的人也就面子上有虧欠的人；這樣一個人的性格發展也不外這兩條路，一用努力來戰勝或補償，那是正常的，一用想像或言詞來掩飾，那是病態的，是於體格的虧缺之上又添上了病態的虧缺，那人格就離完正不遠了。這種精神病態心理學家叫做「自卑的癥結」，一經養成，是不容易消除的。我們以為個人如此，國家也會如此。百年開國國家面子的損破很早就造成了一種集體的自卑的癥結；我們諱疾忌醫，我們深怕有人提到我們的弱點，一經提到，弱者不免面紅耳赤，強者至於擦掌磨拳，我們認為一部分的癥結所在，就是這個自卑的癥結。這癥結存在一天，識相的外國人最好避免一天碰黃中國的事。這是第二重困難。

第三重困難一半也是盟邦的輿論幫同我們造成的。上文不說一年多以前，美國的輿論一致不斷的恭維我們麼？這一番恭維就出了毛病！比起別的民族來，美國人似乎特別容易和別人發人感情，唯其

易，有時候就不免流為一種感傷主義；從這第三重困難的立場說，我們多少是吃了這感傷主義的虧的。上文說到自卑的心理，有自卑心理的人豈不起旁人的冷諷熱嘲，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似乎不大知道，這種人還有更經不起的一種刺激在，就是，旁人的喝采與鼓掌。一向自以為不行的人，一向沒有聽過旁人為他而發的喝采與鼓掌的人，一旦突然聽到，突然發見旁人在對他表示欣賞，是難免不受驚若鶩的。如果采聲聲特別響亮，超出了一種表演者分所應得的程度，在一向有自卑心理的表演者，不但容易作一種客觀的自我批判，認為裝飾過分，愧不敢當，並且會轉進另一種心理的狀態，就是妄自尊大，趾高氣揚的狀態。從受寵若驚進一步到志滿意得，進而步到妄自尊大，是心理上最容易的一個過程。不幸的是，從抗戰第四年起，因緣時會我們就進入了這樣的一個心理過程。抗戰的第四年，民主與軸心的陣線完全明朗化了，二十六國的聯繫成立了，二十六國之中，ABC D，以至於中蘇英美一類的核心關係強化了；從此，我們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們為民主國家擔頭陣的功績一天比一天顯著；此種地位與功績，別人既很客氣的歌頌，我們也就不客氣的自居；別人越是歌頌，我們越是自居；如今采聲聲最熱鬧的場子雖已過去，但達到一年一度的「七七」，這場面多少還須重演一回。三年以來，尤其是從開羅與德黑蘭會議以後，「五強」的聯繫越發見得密切，中國報紙上，最可以引人人聽令人陶醉的字樣無疑的是「四強」與「中蘇英美」了，事實上恐怕明說的「中蘇英美」尤其是適合一般讀者的胃口，因為四強之中，領銜的是中國。我們既愈發愈強，成為四強之一，寢假而成為四強的班首，我們當然不會有甚麼弱點，強國而有弱點是不能想像的事。別人妄加指摘，顯而易見不是吹毛求疵，便是實備求全，甚至於是捉影捕風，任情詆譭！在這樣一個心理狀態之下，試問盟邦觀察家的評論，無論如何客觀，如何善意，會得到我們的歡迎麼？水潑在石塊上，不但吸乾不了，並且還要彈出去。這便是第三重的困難。

▲下文轉由第八頁▼



缺 **5**—**6** 页

經濟建設與企業形態

楊克成

作者在其他寫作機會上，曾提出經濟建設的企業形態問題來討論，並主張將國營民營，或官商營劃分清楚，原文意有未竟，且感於此次抗戰經濟管制的失敗，未嘗不造因於戰時政府對企業組織控制力的薄弱，又鑒於政治的不良，貪污橫行，公私企業混淆不清，一般人所深惡痛絕的官商民利，事實上是官僚階級地位權力破壞法紀，形成經濟社會的紊亂，種種現象，不一而足，但同時展望世界戰局與我國外交形勢，又覺建國前途，日漸樂觀，本問題需要更深切的研究。因此，不揣固陋，再為文中述，如能拋磚引玉，得到更完善更成熟的經建方針，則千百年而後，必能見其積極的為大眾改善生活消極的企業本身避免錯誤，而發生偉大的作用。

國父在民生主義演講裏曾經說過實行民生主義，可以避免階級鬥爭，使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完成，如果在目前建國工作展開之初，不經審判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及利得權，則將來貧富不均的情勢造成，尤其是三不四官官僚資本家的羽翼豐滿，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被掠奪，那麼國父所焦慮的恐怕不幸而言中，建國是百年大計，尤其談計劃經濟，這問題是計劃的主要對象，創始之初，應即特別慎重。

為簡述問題內容方便起見，以下分節討論：

(一) 理想的經濟建設的效果是什麼

經濟活動，是民生的活動，中國的經濟建設，即在求民生問題的解決。但國家有自由平等，然後人民始能安居樂業，故中國的經濟建設，亦須求國力的充實，也就是國防的建設。引用古話，便是求「富」一「強」，再進一步說，富強的基础，不建築在公平的原則上，則民生亦不能康樂。世界上帝國主義的國家未嘗不富強，但他們的人民大

多數並不康樂，這也是不足取的。因此，我們所希望的經濟建設的效果，不僅在不患貧而且在不患不均，這就是近代經濟建設的特徵。不患此，或雖明乎此而故意忽視或逃避，都不足以談今日的經濟建設。有人認為有富強自然有康樂，自然，這話也並不是完全謬誤。即如歐美經濟發展史上，并不曾有計劃的籌算康樂的問題，只是勵精圖治的造成富強的條件，水到渠成，經濟自然繁榮，人民也自然康樂了。有時為顧全勞動階級的福利，而干涉資本家的發展，反而阻礙了經濟建設的進行。但我們要認清，在新興的國家，人口與資源的比例，容許私人盡量的發展，不致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全，美洲的開發是很明顯的先例，但從古老衰敗中復興的中國，實不可同日而語。一個人的自由，一個人的發展，大半影響旁人的生存。所謂一家笑千家哭，權益由新的發掘而來者少，由舊者被侵佔者多，這樣就不能不特別注意多數人的權益。故經濟建設創始之初，應當有計劃佔在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立場來著想。

(二) 如何求得富強

無可諱言，中國是貧弱，其貧弱的原因，國父說是因為中國人民是一盤散沙。從政治觀點說，因社會無組織，人民的力量，是各個分散，所以發揮不出四萬萬五千萬人口應有的實力，故今日須求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在經濟觀點上看，情況亦復如此，我們看中國最大多數人口的企業形態，都是個人的單獨經營，發展至極，仍舊離不開「一家」的範圍，近來公司制度的創設，稍有較大的企業出現，然較之歐美公司股票持有人，普遍的分散到每一人家戶的情形，那真差得遠了。今日普通縣份上，錢匠木匠剃頭匠，雜貨店吃食店堆棧棧棧等等，他們經營主體的範圍，無一不限於個人及其親屬，較之歐美鋼鐵工

業薄弱，而店舖的組織，也顯然薄弱了。這就集中與分散的區別，由此可知經濟建設的要領，也在力量集中，意志集中。

凡力合則強，散則弱，且合力大於分力之和，巨大的企業，非量力莫舉，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的結合，即可以造成一切企業條件的結合。因為資本以貨幣的姿態，可以換取土地，勞力技術原料。故規模企業的先決條件，便是集資，因此金融資本家，佔據着經濟活動的津津，以投資銀行的方式，運用廣大資力的資力，以私人的權威與地位，進一步可以操縱議會，左右選票，所以民主政治，弄成有錢人的政治，不特經濟組織不是公平合理的，連政治上的民主，也變成虛偽的了。不過歐美經濟發展史上，由於產業革命，資本由結合而集中，造成二十世紀的文明，樹立了少數國家的富強的事業，這也是事實。

資本集中的方式，固然有討論的餘地，而欲求富強，必先求資本的集中，倒是不容懷疑的，印度人民藏金豐富，而幾金的人都將資金裝飾在手上腳上，但印度的人民實在世界上最窮的。美國則黃金深藏在聯合儲蓄銀行的黑暗庫房裏，沒有人拿錢在身上，而美國人，是世界上富有的。中國的黃金白銀多埋藏地窖下，與印度相較，真可叫做魯衛之政。因為印度中國的資金都是分散，而不作經濟上的活動，美國却是集中為貨幣的準備，運用在金融家的手裏，在企業上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資本的形式或代表，可為貨幣，或為黃金或為資源或為股份，都需要有相當程度的集中，然後企業效率才能提高，生產的質與量才能增進，國家富強的基础，實繫於此。

(三) 現有的企業形態

集合散漫的人力與財力以從事於資源的開發，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方式。一個人或若干人負擔集合人力財力的責任，身肩事業前途的風險的稱為企業家。(Enterpriser)，事業本身稱為企業(Enterprise)，企業的所有者稱為企業所有人(Proprietor)，即指企業資本所有權(Proprietorship)結合的方式。

在英美普通工商學教育書裏講的企業形態，分為獨資經營，合夥經營，公司經營，托拉斯或加送經營種種，但今日國營事業的興起，演成經濟變化趨勢的一大潮流，合作事業，也是反資本主義的一大運動，與夫基於中國社會流行流傳的「官商合辦」制度，都是普及教育書上談不到的，而其為企業形態，却是異常值得重視的。

若以國營民營這兩種來劃分，則國營形態以國營，獨資，合夥，公司，托拉斯或加送經營，合作形態都是民營，若以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兩種來劃分，則獨資，合夥，公司托拉斯或加送經營形態是資本主義，國營與合作經營形態都是社會主義，但是「官商合辦」形態，却是非牛非馬了。

若以集中人力財力開發資源這兩種來劃分，則一切企業形態，都有集中的效用，單以獨資經營一項來說，中國現階段的企業組織，大多數均在獨資經營的形態。像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當政府逼着他以「公司」的形態改組時，福特先至，福特太太，及小福特三個人便委身於法定股東人數，實際上他們還是一獨家經營，但是他們儲蓄了多麼多錢，收積了多麼多社會財富，開辦了多麼多工廠，生產了多麼多商品，力量之大，超過其他形態組織而成的企業，中國傳統的商號，也可以作為是觀。可見獨資經營，單就集中力量一點作用而論，也可以發揮偉大的效果，不過獨資經營的例外而已。至於合夥，公司，托拉斯或加送經營形態，則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形態，其集中社會經濟力量的功績，已勿庸細述。合作事業是以人的結合為特色，其資本結合的力量，較不顯著，而且遭遇若干困難，但能集中多數的人，亦未嘗不可以集中大量的財力。國營事業的集中人才，藉由政府專制教育及考試制度的權力，遠較民營企業為便。就資本的集中說，藉着政府的財政權，動員企業資本，在國力許可範圍內，運用租稅公債或發行的方法，常無往而不利。甚至像俄國的國營企業資本多數是集中農產品，賤價出售於國際市場得來的，弄得人民生活水準降低到極度，以完成重工業的建設，這是很好的先例。「官商合辦」形態的起因，還是濫清末年，藉着官民合作為口號，利用商資為措詞的，如果這種辦法，沒

有其他的流弊，則集人力財力的立場我們也未嘗不歡迎的。

(四) 如何導致建築

一掃散沙，一堆雜鐵，運用一番科學工程，可以集結成爲鋼骨水泥，分散的勞動力與埋藏的資金，照各種形體的組織原理，可以形成偉大的企業。鋼骨水泥是可愛的，如果用得當的話。企業也是可愛的，企業要是操縱在貪官污吏手裏，也是極可怕的。凡力之集中，可能爲善，可能作大惡，經濟建設的目標，既在富強與康樂，則企業形體之設計，應當求其權而民主。因爲富強與康樂與民衆的表現，運用其求其強而集中，康樂是大多數民衆的權利，康樂受須普及而均備。國家的治，須以民意之肯爲依歸，經濟的措施，須以民衆的福利爲前提，今日談經濟建設的計劃，避免少數人把持操縱，并抑制私人慾望無限制的發達，實在必要的。

有些人慨嘆官辦事業的腐敗，而爲國家資本的前途擔憂，實際上官辦事業不良與政治不良是一事的，非洋軍閥時代的湖北江西煤鐵官辦事業比今日資源委員會在後方所辦鋼鐵業，不知差得多少，是因爲那時候的官僚比今日的技術專家帶的腐敗政治氣味濃厚得多。昔時礦務總辦陳嘉謨今日爲優良是因爲過去北洋軍閥勢力不能干預洋人的地位。此後憲政施行，人民對於官吏結締的議會多，民意機關對國營事業應多予過問。而且政府任用人才的標準確定，考核公開，國營事業的流弊，縱使不能根絕，也可限制到不重要的範圍。至於國營事業的大政方針，是與國家應當一致的，無庸顧慮。換言之，政治與實是民主的，則國營事業的經營，必能與人民的利益趨於一致，不會有衝突的。

一般人對招商局的印象太壞，一提及，就根本懷疑政府的行政官更是否適宜經營經濟事業，其實招商局的壞，不在其法國家營，而在其官商合辦，創始之初，就有組織弄壞了，後來整頓更形不易。例如一個商人因爲有資產而接納了官家，遂躡身而爲官吏，既爲官吏之後，仍舊可以爲商人，以商人的身份與政府合辦經濟事業，又代表政府掌握事業的全權。此種姿態演變到今日，做官的人不必拿錢就取得

東的地位，不必有經營的經驗，就取得管理事業大權。藉政治的權力，集中了財力與物力，藉身份與地位，奪取個人的私利，這正是中國國營有官商合辦的制度的，讓他隱避過去了。這樣制度長久存在，則官商勾結，營私舞弊，全有法律的保障，不惟各個事業無不腐敗，而清明的，而純正潔白的技術專門人材，也難免不合污同流了，至於國家本身的大政方針，因爲有私利私害夾雜其中，將使國家不能推行。以顯顯明的例子不必多舉，只要看抗戰期間後方的怪現象，以官的立場奪商的利益，又以商的立場，逃避官的責任就可明白了。我們承認在國外，有時政府爲推行特種政策，也有臨時加入股本在私人企業以內，但絕沒有像中國經常利用官商合辦爲正當事業的。

合作事業的特點，在一人一權的民主組織，與利益分配的嚴明以資本爲標準的制度。無論所有權或收益權都合乎平均的原則。只惟大規模的企業，因限於多數人民貧弱的經濟力量，未能以合作方式經營。但若政府根據國策，付以巨大的推動力量，並持之以恆，必能對於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予以保存。且於相當的範圍以內集中人財力在國途程中，貢獻他應有的力量。自非普通的觀感，總認爲合作的力量太微弱，對社會經濟很難發揮多少作用，殊不知合作的力量在目前階級上，是分散得看不出來，到鄉下去看一個健全合作社所能發揮的力量，已不微小。例如食鹽鹽合作社承銷以後，只見那一村人民經濟上就寬鬆了不少，過去以農貸形式辦的信用合作，對農民耕作上很有幫助，如能將廣大的民力引入生產合作途徑，其功效必能更大。只要教育上配合這種理想，也不難實現的。

合作事業與獨資，合夥，公司，托拉斯，加迭等形態，同是民營。所不同者是在結合管理分配盈餘等原則上有分別。此種分別，就民衆幸福立場講，是極關重要的。故就國策上檢討，我們顯然看出政府提倡合作事業，而有限制私人資本發展的傾向，理由無須多說，我們要建民生主義的經濟，非這種辦不可的。但反過來說，國策未嘗

法西斯教育的改造

——論日本教育——

(譯自本年二月二十三日遠東觀察雙周刊)

李 廷 傑 譯
By Kenneth K. Kurahara

將來在軍事上戰勝日本的時候，聯合國對於日本的工作，只不過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現在已經頗有一些人，進一步想到，在日本的國內應該促起什麼方式的政治改革，並且還想到，用什麼手段促其實現。同樣，也有人注意到日本在戰爭結束之後，可能遭遇到的種種經濟問題。

重新教育日本的人民，是個同等重要的問題。因為種種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企圖，能否成爲事實，主要得看日本人民的思想，他們的眼界，以及他們的決心如何而定。若就日本今天的教育而言，那是毫無問題的不能引日本人走上民治的路。

要想決定在教育方面應該促起什麼變化，必須先分析當前的日本教育，看看是否應該整個地改換呢，還是有些地方仍然值得保留，以爲改造時的資助。

要讓西洋人知道，在遠東各國中，日本國內識字的人數比率最高（事實上，日本成年人實際全都識字），他們往往會覺得奇怪。因爲識字的人數多，對於走向民治的路本是有好處的。可是，爲什麼在日本却得到了相反的結果？答案要從日本的教育機構，與教育宗旨上去找。

日本教育成爲一個制度，始於一八七二年，從那時起始終受着國家的控制。最初幾年，大半還是以西洋的理想與方法爲依據，受傳教的教師與教會機關相當重的影響。過了十年之後，國家主義的色彩就重起來了。到一八九〇年頒布了「教育勅令」時，性質上就大有改變。此後，西洋的影響漸次減少，忠君愛國成了日本教育的主题。

日本小學教育的根本目標，在教以忠於天皇，忠於帝國。根據條例上的規定，斯巴達式的訓練與「國魂」的陶養也極重要。兒童在學校裏所學的其他一切，就全不重要了。爲了加倍地強調兒童在早年所受的民族理想的訓練，還着重課外活動和社會風習——英雄崇拜的神道教與祖先崇拜的佛教。

日本的小學是有效的宣傳場，因爲一切教科書的編輯與印行，全由文部省掌管。政府想灌輸學生什麼思想，就可以灌輸什麼思想。隨便翻一翻他們的國語讀本，以及修身，公民，日本史等課本，立時可以看出顯印着（政府）穩含的愛國態度，溢於言表。

根據一九四〇——四一年的日本年鑑記載，一九三八年日本各級各種的學校共四八，六三七所，學生共一五，六三八，七八〇人。在這類學校中，有二五，九〇六所小學，把「皇道」，「日本主義」，「國策」等觀念，強制地填塞進一一，七九二，七三三八個小學生的腦子裏。

兒童自六歲起強迫入學，一直念完六個年級。日本的兒童教育起始甚早，正是利用他們還沒有批判能力，而且感受性最強的時分。大多數兒童，念過六年書之後，在學校以外各地，在家庭，在工作場所，聽無聲的音節目，看報紙，讀雜誌，在戲院裏，各種文化機關裏，可說無時地不在繼續他們的愛國思想的訓練。

所有的小學畢業生，只有百分之十六左右升入中學。中等學校約有一七，六〇〇所，很幸運能進中學的，便在這裏繼續受日本理想的

陶冶。中等學校的課程，比起小學來，在性質上固然更重職業訓練，但在內容上却更重愛國思想了。不用普通的操練，中學男女現在都練習特殊的體育——擊劍和「柔道」。更可注意的是軍事學和軍事操，這些功課小學沒有的。

早自一八八六年起，軍訓就加在日本中等學校的課程裏了，但自一九二五年之後，更積極加緊，指定若干軍官擔任這方面的教習工作。日本的學校軍訓，比起美國的「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來，還更嚴格，更實在，因為他還包括有實際戰術實習呢。

根絕「危險思想」

日本的中等學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但皆受政府的嚴格控制。大多數的中學教科書，全由文部省編印；不是文部省編印的，也全得經過文部省附設的「圖書局」許可。中學生求知的好奇心，不許可同任何「危險思想」接觸。即使在課外，他們也無法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因為從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危險的」讀物。

不用說，中學的男女學生在校外所得到的影響，是和小學校的兒童一樣的。政府替他們把思想都安排好了。其主要不同之點是，中學生弄得比小學生更為「帝國意識」些而已。

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情形略有不同。很明顯的，政府無法簡單地硬壓大學生的鼻子拖走。順便插一句話，日本大學生，平均一般地說，比美國同等程度的學生，在智慧上似乎更成熟些，更穩重些。

據最近頗為可靠的數字，日本的專科以上學校共二百五十九所——大學及獨立學院一百六十三所，工商專科學校六十一所，大學初級部三十二所，師範學院四所。其中最好的學校都集中在東京。如東京帝大，慶應，早稻田，明治，日本，法政，文理科，商科，等是。政府經營的大學與專科學校，通常設備較好，保持的學術水準也較高。

大學教科書及輔助讀物必須經過政府審定。然而：任大學及專科學校裏，還有些方便，許可有獨立的思想，作獨立的研究工作。大學生出大學之後有個好處，就是他們還可以享受到相當自由的教育。因

日本最有名的教授，都是曾經在西洋大學，或完全自由的學術空氣裏薰陶過的。

許多比較大的大學，自己都有社會研究的組織，隨便舉幾個例，比如說京都帝大的經濟學會等都是。這些組織，連同大學以外的若干研究團體，對於社會問題，作真正的探討。他們的科學工作結果，常被旁人為了私己的目的而使用時，他們也不會見怪的。

注重軍訓

自從一九三八年起，高級軍訓在大學及專科學校裏，成有強迫必修科；所有大學男生必得修習三年的軍訓。大學軍訓的實質點在軍事學，不在戰術。因其目的在訓練後補軍官，而不是訓練普通的士兵。而另一方面，中學的軍訓則是着重戰術的。

大學課程最特別的是，很明顯地，沒有社會學。可是，似是而非地，在日本的經濟文獻裏，却非常之注意馬克斯經濟思想。即使那些頂守舊的經濟學者，對於激進的經濟說都出乎我們意料地熱習。

完全與「福利經濟」不同的「企業經濟」，是當今日本人共同接受的經濟學說。近來，由於事實所迫，新重商主義的，或「國社主義」的經濟思想，漸已代替了正統派的自由經濟學。有許多在大學教書著名的人，因為講授政府禁止的「危險思想」，而作了犧牲。京都帝大的河上教授東京帝大的美濃部教授都是顯著的例子。

自從一九三八年，荒木貞夫將軍掌管了文部省之後，反自由主義的運動可說到了極端。全國各地的前進的教師被大量解聘，有些教師以犯散播「危險思想」的罪名而被捕入獄。有自由思想的學生，同樣遭受了嚴厲的處分。

田中義一當政之後，一九二五年通過了「和平保障法令」。此後，文部省附設的「思想局」的作用，因之也更加強了。在此法令之下，曾經大規模地檢查左派文字，干涉勞工運動；對於凡是倡導和平主義，廢除私產制度，推翻帝國等思想的人，尤加以無情的抑制。一九二八年修訂之後，變本加厲，凡違犯此法令者，或處死刑，或處無期徒刑。運動法律的長久存在，正足以證明日本相信自由思想的人實佔

少數。

因此，前者的教師與學生，自然全部被迫遵守戒律了。他們不敢發表「危險思想」，更不能去參與任何政治運動。所謂「危險思想」被解釋得非常之廣泛。傳統思想是危險的共產主義固然是「危險思想」，其實連任何自由思想都一概包括進去。

事實上，整個的日本教育，可說已經是一「軍事法西斯」觀念的化身。日本學校的存在，是為了國家，不是為了人民。文部省早規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政策。人民所習，所見，所讀，所信，一切全在統制着他們的黨派的統制之下。學術自由，從未所聞，學術界以外的人也決不能享受思想自由。一切的一切，都受制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

傳統與將來

且不批評日本的正式教育制度，讓我們給日本的知識傳統一個客觀的估計。首先要說的，日本人對於知識階級一向有很深的崇敬！崇敬到所謂知識分子都享有很高的尊榮。在這種情況之下，知識分子雖然入教較少，生活不大綽裕，但他們却滿可以從「精神的入教」(用於音樂而來)得到平衡。「學術人」的情形尤其如此。日本作父母的，一般都是自己省吃儉用，儘量供給子女受教育。這與其他國家，往往輕視知識者不同。

日本人的求知慾頗強，讀書也熱心。這現象從教室裏，圖書館裏，書店裏的情形都可以證明。大家全知道，日本的頭等報紙，如「東京朝日新聞」，銷行之廣，堪與英美的主要報紙相提並論。求知慾所需要的只是妥當的出路，讀者所需要的是比較健全之讀物。

既在這樣的傳統，日本教育的改造問題，關鍵所繫全在教育的基本政策之改變。這只需就現行的教育制度予以改變，即已足夠。傳統的教育集權制固無須乎取消。事實上，接受上面的管轄，已經成了深深的傳統；集權制取消，是否是個不明確辦法，不無疑問。如有開明前進的領導，這舊有的機構，加以適當的調整，也可以領導人民的思想，走向新方向。但領導的人，至少在最初，恐怕還得從上面

產生。

觀念的自由貿易之必要

無論如何，「知識階級」的辦法(用一種警語，專門作「思想控制」的活動)應該廢除。因其無疑地是妨礙知識進步的物。「和平保障法令」即不徹底廢除，亦須大加改訂，因其足以使一切的社會自由，與人民權利，均成毫無意義之物。「危險的思想」即便仍然非要控制不可，也得給它下個新定義。根本上說，日本應參加完全自由的國際貿易；貨物與服務固宜如此，觀念亦宜如此。

凡用意在促進國家主義的學科與活動，最好都取消。至於教科書，「文部省圖書局」的政策得徹底改變一下。應該指定一個獨立的研究機關，實際專門掌管學校用書的工作；督編好了，印行的事還無妨像目前一樣，交給政府去辦理。大學中學的教科書與參考書可以讓每個出版當局，在不違背中央威權的原則之下，自己決定。現存關於許多教科書的禁令之門，絕對應該開放。

至於教育的領導者，如果從下列幾個地「撤換」，亦非善策。日本的教育與領導者已習慣威權的控制；中央威權一論決定任何新政策，他們都無異地可以推行。當然，目前以反動聞名的人士，決不能再讓他們負領導教育的責任。可是更緊要的長得訓練小學教師。小學教師佔全國教師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他們給予未成年人的影響，最足重視，現行師範學校的課程必得徹底改變。這，當然像其他的教育改革一樣，應以制度為主，不應以人為去。整個教育制度若為前進的、非反動的政治思想所支配，則教育領導者無疑地會走上正軌。在過去一個短時期間，日本能有今天的西化程度，正足以證明日本人的實際順應能力與改體性。而且，日本人并非個個缺乏前進的心理。今天他們在受着壓制。將來他們會把國家最好的文化傳統表現出來。

詳細的條目現在不能決定，但以後日本教育改造的方案大致情形以該國為準。在日本，不但一定得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且得先保證與國外有思想交通的自由。與政治經濟的改造為一體。教育改造亦須以較大之自由與國際合作為主旨。

民族活力的毀滅

論明代的特務組織——錦衣衛和東西廠

吳晗

(一)

在舊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比較統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隨時有待爆發的火山。為國威權和利益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種種的法子，公開的律例，刑章，公開的學校和法庭不敷用，也便用，他還需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務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他們用秘密的方法偵伺，搜查，逮捕，審訊，處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茶樓酒館，在集會場所，甚至在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類人在活動。執行這些任務的特務組織，歷代都有。在漢有「監獄」和「大誰何」，在唐有「監禁門」和「不良人」，在宋有「密探」和「內軍巡院」，在明有錦衣衛和東西廠，在盛世則時代則有一「偵探隊」。

錦衣衛和東西廠的人合稱為特務。從十四世紀初期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這兩種特務組織在中國中間經過幾度短期的廢止，但不久即復發。錦衣衛是外廷的偵探機關，東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錦衣衛也受其偵察。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內廷親軍，皇帝的私人衛隊，不歸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鎮撫，南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北鎮撫司專治詭獄，可以直接取詔行專，不必經過外廷法官的法律手續，甚至本衛長官亦不得干預。(王世貞錦衣志)錦衣衛的正式職務，明代史書官志說是一「掌待衛緝捕刑獄之事，凡盜賊奸宄衛盜溝洫，密緝而時省之。」經過嘉靖初年裁汰後，縮小職權，改為「專察不軌

妖言人命強盜重事」。(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偵察「不軌妖言」，不軌指政治上的反動者或黨派，妖言指宗教的集團如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等。明太祖出身於香軍，深知「一語的降生」和「明王出世」等宗教傳說，對於渴望改善生活的一般農民，所發生的政治作用，是如何重大。他尤其了解聚眾結社對現實政權有何種巨大的威脅和威脅，他從這兩種活動中感到政權，也已為這股極端下流基礎，一使他焦急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永遠子子孫孫都能不費事地繼承政權。他所感到的嚴重危險有兩方面，其一是這股起事的諸將，個個都身經百戰，身帶難制。其二是出身豪室的文臣他們有地方的歷史力量，有政治的聲望，又有計謀，不容易對付。這些人在他即位的時候，固然難於得下，但也還喘喘不安。身後的繼承人呢，太子忠厚柔仁，只知守成，不能應變。到太子死後，他已是望七高年，太孫不出幼穉，而且比他兒子更不中用，成天用一批腐儒接近，身慕三王，學齊儒術，更非制馭梟雄的腳色。他需要使自已安心，要替他兒子掃除刑獄，便不惜用一切可能的殘酷手段，大興胡藍黨案，屠殺功臣，又用刑更治，治亂國重刑的口實，把中外官吏地主豪紳也屠殺淘汰了一下，錦衣衛的創立和授權，便是發揮這個作用。經過幾次的大屠殺以後，臣民側足而立，覺得自己的地位已經安定了。為了緩和太過緊張的空氣，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九)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錦衣衛所禁閉的囚徒都發刑部。再隔六年，胡黨藍黨都已發覺，不再感覺到政治上的威脅了，於是又解除錦衣衛的典詔獄權。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案件都由法司治理。天下從此算太平了。(明史刑法志)

不到十年，帝位發生爭執，增難兵起，以庶子出藩北平的燕王入居大位，打了幾年血仗，雖然到了南京，名義上算作了皇帝，可是地位仍不穩固。因為第一，建文帝有出亡的傳說，宮內自焚的遺體中不能決定是否建文帝也在內，假如萬一建文帝未死，很有起兵復國的可能。第二他以庶子繼位，和他地位相同四十幾歲的親王看燕王，保不住也重玩一次靖難的把戲。(這一節在他生前算是禍區，可是到孫子登位後，果然又鬧了一次叔姪交兵。)第三當時他的兵力所及的只是由北平到南京一條交通線，其他地方只是外表表示服從，第四建文帝的臣下，在朝的如曹國公李景隆驍馬都尉程廣等，在地方的如盛庸平安何福等都會和他敵對作戰。其他地方官吏或憤憤也都是建文舊人，不能立地金鑿更動。在在使他感覺有臨深履薄之恐懼。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用得着他父親傳下的衣鉢是錦衣衛軍復活動，一直到亡國，始終作皇帝的眼目，担任擴大和屠夫的重任。

錦衣衛雖然親近，到底是外官也會徇情面，仍是不敢放心。明成祖初起時會利用建文帝在左右的宦官探消息，即位以後，以為這些內官忠心可靠，特設一個東廠，職務是「緝訪盜賊妖言大奸等」完全和錦衣衛相同。屬官有貼刑官，以錦衣衛十百戶充任，所不同的是用內臣提督，通常都以司監兼領太監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關係和皇帝最密切，威權也最重。(明史刑法志。職官志)以後雖有時罷罷，名義也有時更換為西廠或外廠，或東西廠內外廠並設，或在東西廠之上加設內行廠，運東西廠也在伺察之下。但在實際上，廠的使命是沒有什麼變更的。

廠員自成爲皇帝私人的特種偵探機關，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東(西)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有時或加設一最高機關，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如劉謹的內行廠和馮保的內廠，皇帝則直接督督一切偵探機關。如此層層糾伺，層層作惡，人人自疑，人人目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11)

廠衛兩時也是高法庭，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訊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權力。

衛的長官是指揮使，其下有官校，專司偵察，名爲緝緝。嘉靖時陸炳官總帥，所選用衛士緝騎皆都中大軍，善把持長短，多布耳目，所驅馳無不立碎。所召募畿輔察管魯衛驛騎皆超乘馳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五六萬人。(王世貞錦衣志)四出訪緝：「凡緝紳之門，各有數人往來其間，而凡所緝訪，止屬風聞，多涉曖昧，雖有心口，無可辯白。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捕風捉影，每附會以仇其姦，非法拷訊，時威逼以強其認」。(傳維麟明書卷七十三)結果，一般仕宦階級都嚇得提心吊胆，「常憂起早關，身敢偶語，族校過門，如被大盜」。(明史刑法志)「抓到了人時先找一個平廟廟宇撈了一頓，名爲打掃，一有真盜倖免，故令多舉平民以借債者，有括家囊爲生財，而通規惡以證其事者，有潛指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誣禁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而荼毒連累以死者。」訪拿所及，則「家資一空，甚至併同室之有而屠擄以去，無則置於橫野火長殺尉之手，重則官與瓜分。」被訪拿的一入獄門，便無生理，「五毒備嘗，肢體不全。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如血，死而復生，如是者二三，茶酷之下，何獄不成。」(明書七十三)

其提人則止憑寫帖，弘治元年(公元一四八八)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近者中外提人，只憑寫帖，既不用符，真偽莫辨，好人燒命，何以拒之？一當時雖然明令恢復批文提人的制度，可是錦衣衛按律依舊照舊制拘捕。(明史刑法志)：「正德初周繼所說：「繩者皇親貴胄所奏，陛下檢其一箇之詞，即行差有濟獨帖心入於數百里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垂光集一論治化疏)便是一箇例子。

東廠的體制，在內廷衙門中最高最重。凡內官奉差關防皆曰其處

若愚的志十六)明史記「其德後皆以爲節，最輕巧僞借乃充之。伊長曰：「權，指上鏡，衣青素○領，繫小纒，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者子數人爲幹事，京師亡命匪徒，皆視幹事者爲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以播報，德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曰事日起數，金曰買紀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掃，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詩符牒，賄如數便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飲酒酒，亦曰撥○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搜其家索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新不予，予不足，立關上，下鑰檢司獄，立死矣。」對於行政官吏職在，也判處派。伺察：「每月且廢後數百人擊鼓庭中，分職官府，」有職記坐記之別，「其職中府諸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控訊重犯者曰職記，他官府及各城門緝訪曰坐記。」刑得職記者爲打事件，即時由東廠轉呈皇帝。甚深更半夜也可隨時呈遞，「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私事，宮中或傳爲笑話，上下惕息，無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錦衣衛到底是不止皮鞭刑，官告要用奏疏，取廢則可以直達。以此，權權就高於衛。

東廠的淫威，試舉一例。當天啓時。有四個朋友半夜裏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酒酣耳熱，有一人因酒醉而昏，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罵猶未了，便有番子突入，把四人都捉去，在密室前把番話這人割了，餘三人賞一貲銀放還，這三人對付就不附體。差一點變成瘋子。

錦衣衛獄即世所稱詔獄，由北鎮撫司帶領。北鎮撫司本來是錦衣衛指揮使的屬官，品秩極低，成化十四年(公元一四七八)增歸北司，一切刑罰不必關白本衛，運衛所行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呈皇帝。詔獄，備指使不敢干預，因之權勢日重。(明史卷九十五)外廷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不敢與抗。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二)刑科給事中劉濟上言：「國家重三法司以理刑獄，其後乃有錦衣衛橫司帝理詔獄，辨訪於緝賊之門，嚴鎮於詔獄之手，裁決於內降之旨，爾三法司盡於虛設矣。」(明世宗本紀)其用刑之慘酷，

非人與所當道。沙在詔獄：一月能解可原，及至極等重時，始下錦衣之鎖，橫司拷問，尋常止曰打着問，重者加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曰好生着實打着問，必用刑一套，凡十八種，無不試之。

(野獲編卷二十一)用刑一套爲全刑，曰杖，曰鞭，曰拶，曰拶，曰夾棍，五毒備具，呼號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明史刑法志」詔獄「室岸入地，騰厚數仞，即隔壁號呼，悄不開聲，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檢查，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設寒下濕咬冷痰冷納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得相面。惟於拷問之期，得遙於堂下相見。」(野獲編)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瑣竊竊被審的顧大章所作獄中雜記裏說：「予入詔獄百日而卒，皆與人相見，前之通問者皆親證也。」身詔獄和刑部獄相比，竟有天堂地獄之別。聖武粘在他的陳時政急疏中也說：「往者魏崔之世，凡屬詔獄，即煩纒，一繩提，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有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聖忠宣公集卷一)被提者一入詔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率旨押拘，許既迎二憲、忠賢，廣徵)意，構注文官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途斷斷如兩造之相質，一拶蔽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槓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聞不得宣。」「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付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而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嚴衛勒令追贖，「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此時蒙蒙跪地，詞語百出，縲縲之，施租則受，施移則受，施移與夾，仍被扯錄以受棍，旬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橙，平臥堂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終於由獄卒之手秘密斃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蓋屍尸出牢戶，由刑部。六君子是楊蓮左光斗大中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爲了爲魏忠賢所忌，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枉死於詔。

詔獄，便無申訴餘地，坐受榜掠。魏大中自記年譜：「十三日入都，錦衣衛東司房，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率旨押拘，許既迎二憲、忠賢，廣徵)意，構注文官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途斷斷如兩造之相質，一拶蔽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槓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聞不得宣。」「六君子」被坐的罪名是受熊廷弼的賄賂，有的被刑自付無生理，不得已承順，希望能轉刑而得生路，不料結果更壞，嚴衛勒令追贖，「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此時蒙蒙跪地，詞語百出，縲縲之，施租則受，施移則受，施移與夾，仍被扯錄以受棍，旬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橙，平臥堂下。」(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終於由獄卒之手秘密斃死，死者家人至不知其死法及死期，蓋屍尸出牢戶，由刑部。六君子是楊蓮左光斗大中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都是當時的清流領袖，朝野表率，爲了爲魏忠賢所忌，天啓五年(公元一六二五)枉死於詔。

除了在獄中的非刑以外，和應備五刑之徒的一件是廷杖，錦衣衛自明太祖，專為明成祖所創設，廷杖即是抄襲前朝的。

在元朝以前，官階之刑的距離還十分懸絕，三公以前論道，知事是御史，宋制雖然極嚴，嚴無從治，如也還稱大杖，絕不加罪，非禮的行爲，「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傳統的觀念，上下都遵守，蒙古人可不同了，他們根本不瞭解士的價值，也不能理解儒家禮教的莊嚴。他們起自馬上，生活在馬上，政府中的原像也就是軍隊中的將校，一有過錯，拉下來打一頓，打完即舊事，不念也。其實，地方官，在平時，就是在戰時，棍條挨打是家常便飯，甚至中書省的長官，也在殿廷杖的記載，明太祖起而而起，斷然一力「復漢官威儀」，擬定舊制，對於杖責大臣這一舊事，却習慣地繼承下來，著名的例子，「杖死的如親起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都曾被廷杖的主官茹太深。從此殿廷杖，習為常制，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一）年，巡按使徐芬等百四十六人，死百十一人。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二）年，大禮之爭廷杖死者百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循至嘉靖六年，幸而不死，聖公進的仍須受刑，殺仇者得三罰，死。《明史刑法志》：「於前朝和後朝廷杖之不同，是去衣和不去衣，沈德符說：「成化以前諸國被杖者皆去衣，不接腰，然猶有假臥，帶飯旬而後起，去衣受笞，則始於通事，名醫多，全途不取。」（野獲編十八）廷杖的傳形，據文稱所記，行刑的錦衣衛，監刑的是司禮監：「司禮大捕頭，單穿棉袍，首領白帶上犯人來，每一喝則千百人一大喊以應，監刑每服，在喝跪下，官親帖杖者二人，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喝差打，喝打關上棍，次弟凡四十六聲，皆大監應如前首喝時，喝關上棍者關棍在殿上也。杖畢喝下去，杖尉四人以布袱曳之而行。」（熙亭先生文集四恩錄記）天啓時萬璣被杖死的情形，藥材樞密忠貞公傳記：「初璣劫魏曉疏上，瑞憲甚怒，廷杖一百，棍斥為民。彼一時也，維騎甫出，羣聚蜂擁，給舍深禽，飽以恣棒，橫髮提肘，拋查拋殘，與至午門，已無完膚。近之

杖之過，中監數十番，而前，執金吾（錦衣衛指揮使）之自衛人受杖，通稱曰廷杖。國杖張威，施棘手而甘心焉，杖也，風雨淋漓，奄奄待斃。」

此外，還有立枷，創自劉瑾，錫衣衛常用之：「其具極慘，當立三月，為期至二月，已無一全。而受者其立枷，不旬日必絕。偶有弱冠者，命放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凡枷去諸國而死，則守者拾土掩之，俟其殞以前，始奏聞掩埋，若值炎暑，則將有以水浸耳，故諺者謂重於火燒三」（野獲編十八）

詔獄，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其刑罰的距離更求遠，「天皇帝明，臣罪當誅，」打得決死白猶有之曰屈，曰錫杖，轉運固然不到，現主奴間的懸殊原因之而滿然有了

(四)

察備之弊，是當時人抗爭最集中的一個問題，但是毫無效果，並且愈演愈烈。《明史刑法志》：「近日何景雲案，其令太急，刑罰太密，官校提拿，其指用於風聞，暮夜投檢，初不見有怨，人心洶洶，各懷畏懼。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駭心者皆也，亦皆不安於位，有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舉皆不安於業。」（商文毅公集卷一）在這情形下，任何人都時時被捕的危險。反之，真是惡不備，編制巨奸大惡。只要能得到官廳的諷解，便可置身法外，明史刑法志說：「萬曆以後，飲恤之意微，傾伺之風熾，巨惡大察，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或本無死罪，而片紙付詔獄，為編尤烈。」明代二祖設立監衛之本意，原在偵察不軌，尤其是注意官吏的行動。降廢中刑科給事中行化上疏只憑表面事理立論，恰中君主所忌，他說：「朝廷既立監衛，所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竊以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諫官在古諫，朝廷自有公論。」以諫訪之權歸諸監衛，置一人非正直，專出冤誣，是非顛倒。殃及善良，監

下何由知之。且朝廷既選嚴衛，嚴衛必委之委務，其難會幾，何所不至！人心憂危，兼目匪眈，非盛世所宜有也。」（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至於苛擾平民，則更非官廷所計及，楊澹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別指出：「東廠原以察奸細，備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傾陷，片語違權，則結帖立下，濫竽告密，日夜未已。」（楊忠烈公文集二）甚至在魏忠賢失政以後，廠衛的權力仍不因之動搖。劉宗周上疏論其侵法司權限，認為人主私刑，他說：「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為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都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於是錦衣之獄：至東廠鞫事，亦國初定都時偶一行之於大逆大奸，事出一時權宜，後且遂相沿而不復改，得與錦衣衛比用專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猶稱繩墨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蓋較之下，人人重足。」結果是：「自廠衛司鞫訪而告姦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常席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專事仰承獨斷而詭執之風日甚，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劉子全書十六種隨時錄疏，十七數循職疏）

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胆的霹靂，嚇民奸棍遂假為恐詐之工具，京師外郡並受荼毒，其禍較真廠衛更甚。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舉例證說：「如納商劉文斗行貨到京，汗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控於崇文門東小橋廟內，詐銀二千餘兩。長子縣教官推隄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內，口稱廠衛，指為營於得來，詐銀五百兩。山西解官買辦潘鈞應數交足，紫棍親有餘剩在潘鈞舖內，口稱廠衛，指劫官物，捉拿王錫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衙門孔道，假借邊庭，往來如織。……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縱蹤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掃弄風波，不勇不離金陰解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三）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御史楊仁應疏論假借及東廠之害說：「臣特罪兩城，所謂詢訟多以假世故稱冤

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尤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功令比較事件，皆投拜懸償以買事件，受買者爭誇人為如而實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遂以重法，其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東廠之具職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積重之勢庶可稍輕。」（明史刑法志三）抗議者的理由雖然充分到極點，也不能消除統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明史說：「然帝（恩宗）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舊稿，三十三年五月為紀念甲申三百週年重寫於昆明

▲由第九頁轉來▼

否認私人資本經營企業，則節制資本當非絕滅私人資本之謂。同時亦非限定私人資本額在一定範圍內，這種是辦不通的。而且私人資本經營企業，有他特優便利的條件與很可贊美的效率，是應當提倡獎勵的。根據國父民生主義的演講，我們可看出他明白主張抽收過分利得稅。根據建國大綱，他主張限制私人經營生產事業的範圍，如壟斷性公用性的企業之類。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他主張提倡合作事業。並沒有否定民營企業的存在與發展。

企業形態問題，即是計劃經濟方針之一。此時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多餘的。因為近來很少討論，有些人竟自也忘記了。為民生康樂的前提，希望大家注意。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英國菲賓社

(Fabian Society)

王 康

從產業革命發生之後，生產工具與生產制度都有了很大的改進，財富也逐漸地增加，惟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并不為公眾所享受，大公司或托辣斯往往專利經營某一種事業，唯利是圖，貨物的價格皆任其操縱，而對於一般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利益却從不過問。社會對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

在這種情形下自然造成人間許多不平的現象，而促使人們不能不對現成的一切有所懷疑和思慮，所以緊跟隨着產業革命的流弊漫延之際，於十八十九兩世紀中人類歷史乃添增了好多學說與思想，在等這人類的幸福取得的途徑，我們無暇於此文中作各家的介紹，單就十九世紀後期英國的情形來說，英國是產業革命最先發生的地方，一種驟然的變革使社會感受很大的震動，舊的社會組織、舊的政治制度，都無法與新的生產方式相諧和，因此種種畸形的現象乃風起雲湧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混亂，有識之士皆為此而憂懼，終至由思想而行動，由學理的研究進入事實的批判，而最後乃發出改革的呼聲。

這些；特別集中於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左右的數十年中，而於出現在這些年中的許多提倡社會改革的團體會社中，對於有教育的國民的譽論和立法會給以最顯著而有影響的要算菲賓社 (Fabian Society) 了。這一個組織的開始并不太驚人，他的發起且近於偶然，主持的是十二個平凡不知名的人物，但這個組織由於新人才的增加却於半個世紀中變成了英國新政的淵藪，和世界上引導社會改革者的積極的團體，我們回顧這幾十年來英國的進步，多少應歸功於此一「奇蹟」之誕生。

菲賓社原起於一八八二年若十學者所創導的倫理之改革，他們提出組織「新生活同志會」的計劃，希望能根據最高道德的原則改造人

區的生活，這一個組織引起一部分人深刻的思考，其中有十二個人認為經由立法的社會改革最少也好像經由倫理的思慮的自我改革一樣重要，乃脫離「同志會」而從事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并於一八八四年一月成立另一個組織，採用一位羅馬大將菲賓氏的名字為社名，這位大將作戰的時候力主慎重，沒有把握絕不輕舉妄動，而要暫時把敵人一舉殲滅，後來之人遂把菲賓一辭了解作紆紆緩進和行動穩健的代名辭，菲賓社的發起人雖然平庸，但後來的人物却很多是知名之士，近代聞名全球的文豪蕭伯納，威爾斯（後因故退出），以及美國著名的麥克唐納，柯爾，瓦萊士等，都是其中的健將，而對於菲賓社的發展盡力最大的還該推功於限伯夫婦，他們的天才和毅力為英國解救了許多思想上和社會上的危機。

菲賓社的組織并不太複雜，他沒有形式的裝潢，祇是一羣閉閉有為之士的道德的結合，他們也沒有什麼強迫式的固定工作，祇是任從社員秉着良知和熱忱志願地服務。通常，他們都是在羣體領袖的領導之下從事各種問題之研究調查和各種社會活動，這些領袖的形成完全是憑借自己的學識與才能，於社員中逐漸露出頭角而為人所擁戴的。

為了工作的方便菲賓社也分了一些部門，除去事務管理的部門而外，最主要的是研究部——他不僅自動地做各種工作而且常和政府機關合作，特別於勞工與工會方面的成績最為顯著，與外界發生關係的有婦女部，有各大學的菲賓社與社會主義團體，以與高等教育中的人物保持親密的往還，又有補習宣傳的機構以宣揚菲賓社的理論與學說，算作一種實際的活動也是他們真正與廣大羣眾接觸的機會。

菲賓社的經濟的來源，除了一部分是接受各方公開且善意的捐助外，主要的還是依賴自己的出版品和講演的收入，而與其他機關團體

合作的報酬對他們也有不少的幫助。

菲賓社出版了好多著作刊物和小冊子，文章與內容博雅精闢風行於當世，社中人分別研究各種社會病態的由來，探求改良其種種弱點的方法，把研究的心得提供於世人，利用作文或演講來解釋新改革的必要，再四宣揚使人們都相信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可以實現的，菲賓社鼓勵社員參加一切社外的活動，到處都有他們的蹤影，在勞工的政黨中，在議會里，在學術團體里，都有他們工作的成績，當十九廿兩世紀之交的時候，勞工組織逐漸興起，社會主義者的活動普遍而激烈，隈伯等則清楚地見出既得階級勢力之不可侮，剛興的勞工團體并不健全而中間階級則喜愛和平且具有動搖的根性，於是時企圖巨變實不可能，祇足以增添社會的不安和勞動者生活的更貧困，所以他們勸導社會主義者應該利用現行的制度去進行社會的改革，無需坐待社會革命的到來，國家一旦存有社會改革的見解，僱主們一旦承認集體團體而接受國家和職工組合的干涉，社會主義便已經開始實現了。

菲賓社的東恩思想詳載於一八八九年的菲賓社文集，內容分七章由隈伯及蕭伯納等分別擔任撰述，一九二〇年隈伯又加以整頓的補充和修正，他們主要的目的在勸告國人設法把其政治制度做成一種徹底民主的制度，並且把他們的工業社會化以期使國民的生活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的束縛，他們（菲賓社）認定社會是一個不斷在變動的組織，最近百年來民治的進步，不僅在使人民應享有政權，且必須有管理經濟生產的制度，而把社會主義當成民主政治所要達到的經濟的理想，過去放任主義縱容的罪惡已為人所熟知，政府當局應立刻頒佈勞工法令，以保障勞工的利益，政府的職責也不應仍限於外交軍政警察等等事務之管理，而應觸及人民生活各方面的福利，他們又認定初期的資本家還能親自管理工廠，新式公司的推行促進了業務的發展，資本家志在投資乃以經營的責任委託經理，自是便可不必辛苦而獲得最大的利益，所以這種人在社會裏實在是一種不生產的人物，假若果真要將他們與掉對於生產事業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對大規模私人壟斷的企業掃除之方法他們有三種：第一用政府的力量和法令去禁止它們的發展

或解散它們的組織，第二加重它們的捐稅并且訂定嚴厲的條規來限制它們，第三由國家將它們的財產收歸國有由政府經營管理，庶依此而逐漸達到工業社會化之目的。

對於地主也非常之厭惡，他們要使土地和工業資本脫離個人和階級所有權的羈絆，并且把它們交給社會以謀公眾的利益，因此力求消滅土地的私有權及隨之發生，蕭伯納力主廢除地租，他以為土地私有地主和資本家一樣是不勞而獲的人，工商業的發展促使人口的增加，都市地價因此而增高并不是地主的力量，而是社會全體的功績，自然其利益仍應歸諸社會的全體，這些必須工業之由全國組織和指揮，土地和資本的一切經濟租金之由全國佔取，應以最適當的公共機關，教會的，市的，州的，或中央的機關，為其實施的手段，以往的生計工具獨佔的結果，各種工業發明和剩餘收入之變成資本的過程大體上增加了地主階級的財富，而使現在的工人要倚靠那個階級來取得其謀生的許可狀。這些步驟一旦施諸實行而絕不予地主以報償（只予以社會所認為通常的救濟）則租金和利息便將加在勞動的報酬之上，現在靠別人的勞動為生的懶惰階級便必將消滅，而實際的社會平等便可以為各種經濟力量的自然動作所維持，而使個人自由所遭到的干涉速較現制度所引起為少了。

為達到這些目的起見，菲賓社乃從事傳播各種社會主義的見解，并企圖藉此引起各種社會的和政治的改變，包括男女平等公民權利之確立，它從事推廣關於個人與社會在經濟，倫理，和政治各方面上的關係的知識，以期實現這些目的，菲賓社的領導者與社員，皆兼著其認定可以把英國政治行動的整個力量移入明顯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之信念，互相鼓勵對於地方的政事不斷運用其充分的力量，而讀者則白的熱忱參加所有公私團體的活動，積極從事政治工作和充分行使公民權以謀社會的改革，而特別注重的是他們應熟識習其所在地的公務管理的實際機構，與其國會選舉區的情形，此外，菲賓社的社員還應該對於各種社會主義的組織，培養和保持友好的關係，并給以一切可能的幫助，來共同完成英國的改革。

幾十年來非賓社的理想和計劃，都在英國的實際政治中有了輝煌的成就。他們做了許多教育的工作，使許多知識青年於混亂的局面中不再苦悶彷徨而有所去取，使成千成萬的勞動大眾不再陷於無知的盲從而有依歸，他們協助了一切進步份子逐漸完成了英國民主的事業，減少了選舉權的限制，使每一個人都獲得了相當的自由，他們與政府及教會合作組織「護貧委員會」解救了無數苦難的同胞，又曾以最大的同情協助勞工黨的成立，使國會中能有一個明顯的勞工政黨，當婦女運動興起之時，一般庸俗的見解時或鋪張地說及女子之根本無能，時而又完全忽略了她們所負的社會責任。這種混亂是非的判斷是應該排除的，必須先找出性作用的分別所必然引起的心理差別和工作差別究竟有多少，然後始能論及問題的重心，因此非賓社毅然地分担了婦女運動的工作，其主要的目的，在研究和加強婦女的經濟地位，並且使她們起而與男子並駕齊驅，共謀人人之皆有報酬的工作，之皆有平等的利益。

假如我們由以上舉出的一些實際的成就便肯定了非賓社的價值，是非常之不妥，非賓社真正的貢獻不在實際的活動，主要的還是在學說思想之表揚發揮，在理論與實踐之聯繫，自一九〇六年開始，他們設立了一個「非賓社夏令學校」，社員們和他們的友人每年總有三四次，每次的時間由一個星期至三個月不等，生活於這個學校之中，利用着他們的假期來參加關於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演講，並且舉行種種特殊問題之討論，以與非賓社研究部的工作打成一片，另一種教育的進展則為設立經濟學工業史和地方政治的授課班以供各社會主義會社的社員學習的機會，傳播一些正確進步的思想。

這一些教育工作的發展使各「大學非賓社」獲得其真正的使命，他們已不復視社會問題之辦論為滿足，而力求使非賓社與勞工運動的新潮流發生密切的接觸，並且力求打破某些舊非賓社社員之反對所謂社會主義之無階級化之成見，他們漸漸愈加認為社會主義，職工組合運動，和勞工政治為根據集產主義和民主主義以改組社會的一種偉大運動的支流，牛津，劍橋，倫敦，曼徹斯特，

北明罕，利物浦和設非賓社等大學的「大學非賓社」聯合組成一個「同盟」，而由每社推派代表一個連同全國代表兩人構成其執行部，「大學社會主義同盟」遂儼然形成「非賓社」之脊骨了。

非賓社似乎要做成一個推動，曾的機關，他總是把一兩理論和「願實行混合起來的，他根據經驗知道社會主義者正好像常人一樣，絕不能事事如意，所以承認在民主社會中妥協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並不因此竟頓挫了追求進步的勇氣）。

自然，非賓社的理想和目的並非完全一致，自從社員威爾斯（G. Wells）揭起反抗的旗幟之後，反對黨政黨的勢力便日漸增長了，有些社員會主張把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有些則要求較密切地聯繫於勞工黨，在最近的數年中，更有些青年社員，大都是接觸工團主義和工業組合運動的大學人物和作家，從事於行會社會主義的工作，實地滲入社會的各階層。

但是，非賓社畢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而大體上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理論的學派，他祇企圖傳播其關於迫切的社會問題的種種實際見解，並且指出其可藉以體現於立法或行政設施的途徑的知識男女的一個集團罷了，依照這些見解，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工人階級之以成立某種新社會制度為目的的一種革命運動，也不是一種反國會行動和超國家的合作制度，他實是一大串社會問題，為發生於上一世紀的許多經濟的，社會的，和精神的變遷所引起，而為想提高其效能及繼續其向上進展的民族所必須應付的問題的結果。

要想把這些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不能單靠熱情，尤賴事實之深刻的了解，蓋惟有對事實能了解，始可以提出切中時弊的方案，所以非賓社的社員皆專心於學理之研究與社會的調查，（近代英國幾件重要的勞工改革，便皆係根據羅伯夫及柯倫等研究調查的結果而制定的），他們力求使一般國民都知道社會在現存制度之下的病狀，藉以激發社會的良心譴責，乃從事搜集和出版各種翔實而無偏見的統計圖論，或根據各機關的材料編成論著以進行這種工作，當然這種工作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惟知識份子尤其是高等教養階層之人物始可

戈吉野和他的時代

聞家驥

戈吉野Theophile Gautier於一八一一年生於法國西部的達爾布La Hes。他很年輕就到巴黎來了，他在中學的時候即對繪畫發生興趣，畢業以後，入內涅勒先生的繪畫習所，決心以繪畫為他的終身事業。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愛爾拿利Hernani在法蘭西劇院公演，戈吉野便是以繪畫家的名義參加這個歷史上著名的「愛爾拿利的鬥爭」，替浪漫主義捧場，當打手；他這天穿的是紅綬子的背心，黑絨鑲邊的淺灰色的褲子，充分地表現了他對浪漫主義的英勇的熱忱，同時也充分地暴露了他愛好顏色和線條的天性（據說在休息的時候，戈吉野和古典派的觀衆發生爭論真的打起來了）。

一八三〇年以後，戈吉野又放棄繪畫而從事文藝創作了，他這種轉變，一方面受了幾個寫詩的朋友的影響，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的繪畫天才不高，他的眼睛又很近視，使他在透視上不能得心應手，因此不得不改行另闢出路。

戈吉野總共寫了五本詩：（一）詩集；（二）亞勒柏赫主斯Albernus（三）死的喜劇；（四）西班牙；（五）法那與寶石。

他的頭兩本詩只可說是一個年青詩人的習作，在題材和技巧方面還留着很深的浪漫派的影響，「詩集」差不多用的全是雨果的東方策和短歌裏面的材，而「亞勒柏赫主斯」裏面最重要一首故事詩亞勒柏赫主斯，又和另一個浪漫詩人穆塞 Alfred de Musset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裏面的作品極相類似：「死的喜劇」起始，因為他的藝術理論成熟了，（一八三六年發表小集「莫般小姐」），他的藝術主張和他的人生態度在這部小說裏面會與以詳盡的發揮，他才擺脫掉一切和藝術不相干的紛擾，不問他人內心的哀樂，也不問時代的治覆安危，站在時代的圈子外邊，同時又是站在他自己個人的圈子外邊，以一種冷靜的客觀態度，嚴格地遵守他的藝術理論去實行「藝術移植」。

戈吉野詩藝術理論是怎樣呢？他的藝術理論又是怎樣產生的呢？要明白這兩點，我們必需從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政變以後的時代思潮說起。

七月政變以後法國思想界最大的變動是知識份子和社會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在以前，知識份子只是在工作室裏做純理知的工作，現在他們是對社會上的許多現實問題也感覺興趣，例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個人的思想以至一切有關民衆的福利的問題，在七月政變以後都變為一般知識份子討論的中心。這種時代思潮之所以產生，一方面由於外知識份子的熱心救世，另一方面則由於知識份子對「專業」本身發生愛好，他們覺得人生在世，總得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做一番「專業」，單是做研究室裏面的工作那是不够的。

至於藝術，依照當時一般的觀念，不是生活的裝飾而是一種改造社會的工具；藝術應該對社會發生功效，它對社會發生的功效便是它的存在的理由。藝術家和詩人不應該站在時代的旁邊過一種所謂金黃色的放蕩的生活，藝術家和詩人是應該站在時代前面，領導時代的，在某種意義上，藝術也就是一種「專業」。

這種觀念立刻使當時的文藝界改變了面目；在這時候大多數的人都變成「新聞記者」了（這是說他們仍舊的文章，通俗淺近，易於成篇，易於傳播，其性質和日報上約文章相同，並不是說當時的文章都在辦新聞專業），有的文人甚至已經當議員，當部長了，至於一份沒有放棄文藝本位工作的文人，他們也改變了立場，他們現在所採用的題材是羣衆的心理和時代的苦悶，不像以前專寫那種以個人的心靈生活為趣旨的浪漫文學，雖說從整個的浪漫主義講起來，以社會為出發點的文藝主張仍舊是一種浪漫主義。這時候雨果正在極力地宣揚詩人的任務，拉馬丁正在向民衆歌頌家族託度的萬能，同時這兩位詩

人又是兩位政治家，兩果當過國會議員，拉馬丁當過部長；他們的政治生涯和創作生涯是相輔而行的，寫詩對於他們不過是一種副業他們可說是爲了發揚他們的政治理想才來寫詩的。羅曼Alfred de Musset在這時候正在寫他的「國夜詩和「癡梅錄」，在那裏面分析他在戀愛方面的痛苦經驗，讓世界上不幸的人從同病相憐的處境可以安慰，同時每個不幸的人又會知道應該怎樣去解救，去利用自己的痛苦；他認爲詩人的意義正在於他爲了別人的安甯，不惜傾吐他自己的痛苦，他又認爲最悲痛的詩便是最美的詩，穆塞對於詩的意見是否有當，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在這裏應該注意的是這位最放蕩，最瀟灑，最詼諧，在浪漫派中被視爲一個「頑皮的孩子」的青年詩人，現在居然也認真起來了，從社會的觀點出發承認了詩對於人類的貢獻。維尼 Alfre de Vigny 在這時候正在研究聖西孟的社會主義 Le Aocialisme de Claud-Henri Saint-Simon 並且表示他將要遵循以禁欲苦行爲宗旨的斯多依派的學說 le Stoicisme 去復興民族。斯多依派的學說何以能復興民族，難道一點，維尼沒有與以說明，斯多依派的學說究竟是否可以復興民族，這一點也許需要考慮，不過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人性情孤僻，思想深奧，將要走進象牙之塔的悲觀主義的詩人，居然替時代開了一個醫方，而且是依照他自己素所愛好的一種學說替時代開了第一個醫方。批評家聖特佩夫Sainte-Beuve在七月政變的三個月以後就在報紙上表明立場，認爲「藝術家的任務是不斷地用各種顏色去反映正在進化着的人類的情感」；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正在寫她的社會小說，宣傳人道主義，替聖西孟派當發言人。

當時的作家只有戈吉野是例外。他沒有受時代思潮的誘惑，並且還站在另一個極端上面對時代思潮與猛烈的抨擊。

依戈吉野看來，藝術不是一種手段，藝術的存在是爲它自己的，並沒有別的目的，換言之，藝術是爲藝術的。

藝術有什麼用呢？依戈吉野看來，藝術是沒有什麼用的，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可以說藝術的用途是使一切的事物美化。就一般的情形論，美與效用成反比例，一件東西用了用途便不美，只有一件無

所可用的東西才有美的可能性。

藝術雖說沒有什麼用，藝術却是世界上唯一的真，而一個藝術家所苦心焦思以追求的除了美以外沒有別的目的；藝術家也不必顧慮什麼道德和教訓的問題，因爲美就含有善的成份，美和善並不是衝突的，

「誰能遺棄講着：一切美的東西，女人，音樂或者是花，不是隨身

帶來了教訓，帶來了道德？」

美是高於一切的。但是戈吉野所愛好的美，只是一種外在的美，造型的美，並不是一切的美，在這個問題上面，戈吉野又表示他和他那時代是分道揚鑣的了。別的詩人們從心靈裏表現詩人，戈吉野却從說覺表現詩人；別的詩人們也很愛好美。不過別的詩人們沒有把外在的美和內在的美分開來講，雖說他們也不會提出情景交融或主客觀一致的口號，他們似乎還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他們似乎對於美只是表示一種機械的熱烈擁護而已。至於戈吉野則把這兩個問題斬金截鐵地分開；他並不是否認心靈，不過他對心靈幾乎不大感覺興趣了，「世界對於他只有外在的部分是存在的」，因此他所望見的世界，僅僅是「一個人從窗口所望見的世界」，而他所傾心愛好的美，也就是一個人可以用眼睛去看的。

爲什麼戈吉野，這樣地傾心於外在的美呢？原因就由於他從小就酷愛繪畫，原因就由於他二十歲以前跟葛羅先生學習過繪畫，而這點與生俱來的癖好和在少年時代所受的一點基本訓練，便構成了他的天才的永恆的特徵。雖說他已離改行了，但是他的愛好繪畫的本性並沒有改；變他的繪畫癖始終沒有停止過活動，而他對這點癖好始終，就是用一種藝術家的熱情和固執去培養，去將護；他是暫時不在利用他過去的一點繪畫經驗，甚至於可以說他無時不在賣弄他的繪畫經驗，不論打開他的那一部文藝作品，戈吉野總是以一個繪畫家的面目；但讀者相見。他的小說佛拉加士隊長 Capitaine Fraucasse，大部分是描寫路易十三時代的畫片，他的遊記是繪畫師的手冊，在那裏面所有的

都是文字來寫的，他的文學批評和藝術批評是用另一種組織方式的文字將原作品移植過來——只移植而不判斷，讓讀者直接去體認原作品的印象，至於他的詩，那更可以用「藝術移植」一語來說明了。

戈吉野永遠是一個畫家，當初他以畫家的身分加入浪漫陣線，替浪漫主義當打手。後來他仍然以畫家的身分，從繪畫的觀點出發，對浪漫主義深致不滿，於是又退出了浪漫陣線；當他在荷澤先生家裏的時候，他是學習繪畫的，後來，離開了荷澤先生，他仍就是學習繪畫；他拿鋼筆代替畫家的毛筆，拿墨水瓶代替顏色盤，拿字典代替替調顏色的板，他變了繪畫的工具他並沒有放棄繪畫的立場和繪畫的技巧，而且為了盡量發展他的繪畫天才，他不惜從詩的領域裏遷徙了一塊足以妨礙繪畫藝術的成分——思想和感情，使詩變為一種只是描繪形狀和顏色的藝術，在文學的領域裏，開闢了一塊所謂「造型文學」的斷園地；他一生除了繪畫沒有別的癖好，除了繪畫和移植繪畫沒有別的工作，別的作家們忙著「搶救」，他却忙著寫詩，他在「春之微笑」裏寫了這樣的幾句詩：

「常人們爲了他們的淫邪的工作
跑得喘氣，
高笑的「三月」却冒着驟雨，
偷偷地準備着春。」

這裏所說的「四三月」，便是戈吉野自己的寫照，因為戈吉野沒有別的工作，他的工作便是「偷偷地準備着春。」

▲前部二十頁轉來▼

以掛號，因為有這種人具有此種才能，祇有這種人較能博得社會之信任，也祇有這種人在思想上能發生領導的作用，一旦這種人能發生實踐的興趣，便立刻可以發揮正確的改革之功能，使社會趨於繁榮。

菲賓社於幾十年中所以成爲美國社會改革之主要支柱與值得爲人效法者，實在他擁有一羣開明而富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從事理論與實際之聯繫，不再陷於紙上空談或近於麻木的潔身自好，這些人皆有一種對現狀的勇氣，和認識現實與理想間之微妙關係的能力，而穩健地邁向終極的目標來。

關於民主政治（通信） 固城

固城先生是一位在大學教書多年的前輩，這段文字是他最近在給編者的私人信中所討論到的問題，先生的態度非常誠懇，語語真摯，所提意見很值得我們注意。 編者誌

年來談民主者多發生氣，原是教育陶鑄使然。力行者未能實現，官理者未能力行，二者永遠脫節，此實我國民主實現之致命傷，我年來力矯此弊亦矯不盡。三十餘年來之國運降格，其間來龍去脈，最值我人反省。如今回國當國內政治處最低氣壓苦境下時，究有幾人確曾堅持民主之信念而不爲動搖！即以教育界而論，我人亦不能不遺憾於確信民主者之稀少。三十餘年來據政府機關高級職位者不少爲當年英美留學生，此輩新貴之所表現者徒令人寒心，彼輩因緣而結於各種現實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無形中鑄成一阻礙民主之鎖鏈。國運降格，種因均在幾微之間，對此政治上社會上之巨大暗流如仍不思出一有效對策，民主前途必將難堪設想。

嚴格論之，中國十餘年來所走這條陰險路線，決非出於外在國際局面之影響，亦非產自某人個性獨顯，實自有其社會經濟及文化歷史之基礎。十餘年來中國金融資本，土地資本，商業資本以及特種資本之勾結活動，鑄成民主之鎖拷……此種形勢今日仍未退阻，我恐今仍不思有以對付將來必以另一新姿態出現，其時中國人民之生路亦將受阻扼。爭取民主，其道決非在改革政治制度之片虛努力，須用最大努力於社會經濟之改造——包括土地問題之適當解決，金融機構之徹底改組，商業資本之誘導和財經人員之合理調整——惟有創立新的社會構造，才能鞏固真正新民主之基礎。今日如不思從徹底粉碎民主拷鎖工作下手，中國民主絕無前途。中國民主政治之成功須在經濟上求得保證；他日如民主之勢力在經濟上仍安若磐石，我輩子孫則必食今日我輩輩之惡果，此原係極平庸之見地，惟亦不多爲人注意。今日坎坷之局似惟有將國人視線集中於少數個人身上，而多忽視此著少數個人背後所代表之勢力，其害在當易因此而存姑息之心，放開主腦用錯努力。 (續略)

編輯後記

編者

關於我國當前及戰後各種困難問題的解決，我們曾一再指出唯有民主與憲政的實施才是一條康莊大道，民主與憲政的紅線固非萬靈藥，但它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本期社論「政治上的死路與活路」即就此意申論，提供出幾點具體的意見。

「從外人對我的評論說起」係三卷一期的社論，由潘光旦先生執筆，審查處以內容欠妥送呈中不會作最後決定。時潘先生以該文刊載既有問題乃另寄一份與大公報，該報已於九月二十四日作星期論文刊出，同時本社亦隨即通知以該文經中審會審核准予刊載，一般讀者遂得讀該文內容，本報特再行補登。

「法西斯教育的改造」一文提示我們今後民主主義的總一在各方面應作更大的努力，我們希望這篇論文能多少給我們一般努力民主實現的人以啓示。

歐戰史的人，不對明代政治環境之惡劣與腐化深惡痛絕。明政權實際上是在以官商階級為核心的特務組織——錦衣衛與東西廠上，具有極口治之稱。明政權想用武力與恐怖手段來維持於不墜，實際上已失敗了；這不但加速了明政權的腐化與崩潰，而且整個漢民族活力，大半亦被毀滅。當時內外文武不安於位，有司庶府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黎民不安於業，國為腐敗政治獲得至極的結果，人人自危，個人人格全被破滅。我們看有明一代，朝廷文武大臣對朝見時踐行跪對與廷杖之甘受無抗一事，士風之敗壞可謂已達極點，讀史者至此不禁為民族活力之毀滅一哭。「民族活力的毀滅」一文中所提出的這段極令人遺憾的史事，願讀者們深思。

李樹青先生「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的商榷」一文奉命免登。我們謹對作者與讀者致歉。政府不久以前曾有放寬檢查尺度的話，但我們的經驗今天事實與此項籠統語言距離尚頗遙遠。這事實我們希望國人密切注意。關於戰時言論自由，我們曾引英國著名學者拉斯基的話：「實際上限制批評乃無異於保證謬誤與冤獄的必然發生。因為一旦批評的權利被撤銷之後，當局者很容易犯那些獨裁者必然要犯的錯誤。它把它自己的行動半神化起來。它不供給人民以可引起批評的消息，它以宣傳方法誤導時局的真象。」言論自由的權利在戰時更應予以充分的發揮，因為在國家危急之秋。人人有權利有義務對明白「政府意見的統一並不能抵禦由抑言論所引起之損失。」李先生在免登的文章中說：「政府發言人還得引英美戰時言論檢查制，其實我們還難以監視和提防盜賊的心理，從事制定法令，從事檢查，與英美政府與人民難以共信共諒的態度來處理政務，相去何嘗天壤。」我們也願李先生這話是多餘的。

潘光旦先生的「政治與教育」書評本期因篇幅，移至下期刊載。

自由論壇星期增刊：

每星期日出版 定價：零售每份十元 預定每十期一百元。

每人定閱以三十期為限。

直接定戶不受加價影響。

凡介紹直接訂戶十份者贈閱十期。

昆明天成永金店

正義路一四二號一四三號

特聘

等技術精作各

式樣玲

種首飾

鑲新穎 成色保

工作特

證十足

別認真 交件準

如蒙各

期迅速

界賜顧 毋任竭

誠歡迎

美國伊黎，魏爾萬合著

李樹青先生譯

土地經濟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土地經濟學為一門最新興起的科學，內容討論土地的性質及農地，林地，礦地，水利，及都市地的利用方法與經濟原則。原書為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專家伊黎與魏爾萬兩教授精心結構的著作，並係目前美國各大學唯一權威課本。現經李樹青教授譯成中文。譯本並根據原著者寄來的最新資料加以修正及補充，尤為難得。現商務印書館已出上册。特此介紹。

服務大眾之國家銀行 郵政儲金匯業局

◀營業範圍▶

存款 往來存款(用支票)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用存摺) 存本付息零存整付

放款 活期押放 定期押放 活存透支 活押透支
票據貼現 進口押匯 出口押匯 房地押款

匯兌 普通匯票 電匯 票小 票匯

兌現 定款匯票 郵政儲蓄支匯 國際匯票

保險 終身保險 定期保險
團體保險 養老保險

◀本行特點▶

首先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獨家發行節約建國儲金郵匯
即將發行黃金儲蓄券
代理國庫代收所得稅代售獎券
經理一切銀行業務信用穩固
服務週到手續簡便服務公衆

昆明分局：地址：南屏街電話號碼：三三三三
六八四

自由論壇月刊

第三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社長兼發行人

郭相卿

編輯者

自由論壇社

經售者

自由論壇社
昆明南屏街一三六號

預定辦法：

訂定半年六期一百五十元優待學主照價
定價折歡迎直接定閱請逕向本社訂購

本期零售：每册國幣二十五元

徵求檢字技工

茲有某印刷工廠需要熟練檢字技工數名待遇
係按照固定工作及活動工作兩種合併計算每
月除供膳食外由陸任元至玖仟元若確有熟練
技術願意應徵者請於三日內每日午前八時至
九時親到西車站五十一號號房處先行登記後
持證入內向主管人員面洽以便斟酌決定

十月四日